

历史档案书系

房伟 编

颠覆与重建

——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历史叙事思潮研究史料辑



人民出版社

颠覆与重建

—— 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历史叙事思潮研究史料辑

房伟 / 编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李 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颠覆与重建——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历史叙事思潮研究史料辑/房伟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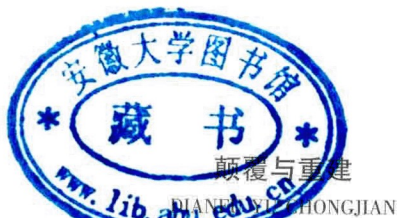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

(20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历史档案书系/魏建主编)

ISBN 978-7-01-014243-2

I. ①颠… II. ①房…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3516号



——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历史叙事思潮研究史料辑

房伟 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0

字数:330千字 印数:0,001-1,500册

ISBN 978-7-01-014243-2 定价:52.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重大科研项目

20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历史档案书系

魏建 / 主编

文学史的另一做法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历史档案书系》序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是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申请的特色国家重点学科重大科研项目。《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的学术参照首先是来自丹麦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所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

一百多年来,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一直是中国文学研究界公认的文学史经典之作。中国学人为什么推崇这部著作?为什么能推崇一个多世纪?究竟是书中的什么东西构成为中国学人的集体性认同呢?

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来说,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07年鲁迅先生写《摩罗诗力说》的时候就向中国人介绍这位“丹麦评鹭家”^①。此后鲁迅多次提及勃兰兑斯和他的《十九世纪文学新潮》^②。鲁迅先生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还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史家。他对文学史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但很少向人推荐文学史著作。勃兰兑斯的这部书却是他向人推荐的为数极少的文学史著作之一。《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学术生命力主要来自它作为文学史的独标一格。直至今日,第一次阅读这套书的中国学人,依然大为惊叹:文学史原来也可以这样写!这种惊叹包括很多内容:文学史原来也可以这样抒情!文学史原来也可以写那么多的故事!文学史的行文原来可以这样自由地表达!文学史的结构原来可以这样的随意组合……当然,惊叹之余,读者大都少不了对这种文学史写法的将信将疑。“将信”是因

^① 《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② 这是当时的译名。现在通译为“《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为被书中的观点和引人入胜的文字打动,“将疑”是因为书中有太多名不副实的东西,如:名为“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实为十九世纪初至二三十年代的文学现象,最晚的才到1848年;书名没有地域范围(好似十九世纪世界文学主流),然则只是欧洲,又仅仅限于英、法、德三国;名为“主流”,有些分册论述的像是“支流”,如“流亡文学”、“青年德意志”等。

虽然中国学界不断有人对此书提出一些异议和保留,但《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作为文学史著作的经典地位始终没有动摇。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但凡是经典著作都有可供不断阐释的丰富内涵。起初中国学者首先看重此书的,大约是认同其革命主题(如“把文学运动看作一场进步与反动的斗争”^①)和适合中国人的文学价值观(为人生、为社会、为时代),还有对欧洲文学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当时多称之为“自然主义”)文学潮流的描述。1980年代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在中国最走红的时期,书中“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②成为中国大陆文学史研究界引用最多的名言之一。书中“处处把文学归结为生活”^③的“思想原则”成为当时中国文学研究者人所共知的文学理念。后来,书中标榜的精神追求(“无拘无束、淋漓尽致的表现”“独立而卓越的人类灵魂”^④)和比较文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更为中国的学术新生代所接受。近年来,中国学界对《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关注热情虽然有所减弱,但对它的解读更为多元,少了一些盲目的崇拜,多了一些客观的认知。正是在这种相对客观的解读和对话中,《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给我们的启示越来越多。

综上,《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总是能够不断地进入不同时期中国学者的期待视野。其内涵的丰富完全是由阅读建构起来的,换句话说这是一部读出来的文学史巨著。我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的学术起点是以对《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全面认同为基础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的学术目标就是想撰写一部像《十九世纪文学主流》那样的文学史著作。

① [丹麦]勃兰兑斯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出版前言”第1页。

② [丹麦]勃兰兑斯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引言”第1页。

③ [丹麦]勃兰兑斯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刘半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④ [丹麦]勃兰兑斯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李宗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

二

当然,《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中国人对这部巨著的认识还有很多误读,所得观点有很多属于望文生义的想当然,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被忽略。例如,对其中独具特色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就缺乏足够的重视,而我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课题组在文学史研究方法上就从《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获得了诸多启示。

我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课题组在文学史研究方法上所获得的第一个启示是思辨与实证的结合。《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是将抽象思辨与具体实证结合在一起的一部著作,并且结合得比较成功。可是,迄今为止中国学人谈论《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更多地看取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过于渲染《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如何“哲学化”地“进行分馏”^①,如何高屋建瓴般将文学“主流”提炼出来,却大都忽视了这是一部实证主义倾向非常显明的文学史著作。读过《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人一定不会忘记,在第二册的目录之前,整整一页只印着这样几个字:

敬 献

伊波利特·泰纳先生

作 者

除了对伊波利特·泰纳,没有第二个人在书中获此殊荣。而伊波利特·泰纳是主张用纯客观的观点和实证的方法解说文学艺术问题的最有影响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之一。勃兰兑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师法伊波利特·泰纳“科学的实证”的批评方法。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他将思辨与实证相结合,所以才能把高远的学术目标落实到脚踏实地的具体研究工作中,才能做到既有理,又有据。这是勃兰兑斯的做法,也是前人成功经验的总结,尤其在当下中国学术界依然充斥“假、大、空”学风的浮躁氛围里,思辨与实证的结合更应成为我们在研究方法上的首选。

在文学史的叙述方法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课题组所获得的启示是宏观概括渗透到微观描述中。作为文学史的叙述方法,《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在宏观历史叙述与微观历史叙述结合方面做得相当成功。然而,多年

① [丹麦]勃兰兑斯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刘半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扉页1。

来中国学者更多地看取其宏观历史叙述一面而忽视了它微观历史叙述的另一面。对此,勃兰兑斯在书中讲得很清楚,他“有许多作品需要评论,有许多人物需要描述,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只从一个方面来照明整体,使主要特征突现出来,引人注目,乃是我的原则。”^①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勃兰兑斯的宏观历史叙述就是概括“主要特征”,其微观历史叙述就是凸显历史细节、包括许许多多的逸闻趣事。这二者如何结合呢?勃兰兑斯的做法是:“始终将原则体现在趣闻轶事之中”^②。的确,《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的大多数章节都是从小处入手的,流露出对“趣闻轶事”的浓厚兴趣。然而,无论勃兰兑斯叙述的笔致怎样细致,但他叙述的眼光可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时代、民族、宗教、政治、地理等大处着眼。让读者从这些琐细的事件中看到人物的心灵,再从人物的心灵中折射出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一个种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某些东西。这就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一个个小事件里所蕴含的大气度。

在文学史的结构方法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课题组所获得的启示是以个案透视整体。从著作结构上来看,《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好像没有任何外在的叙述线索,全书呈现给读者的是把英、法、德三个国家的六个文学思潮划分为六个分册。每一分册之间没有任何明显的逻辑关系。对此,勃兰兑斯做过两个形象的比喻解说他的各分册与全书之间的关系。第一个比喻是:“我准备描绘的是一个带有戏剧的形式与特征的历史运动。我打算分作六个不同的文学集团来讲,可以把它们看作是构成一部大戏的六个场景。”^③第二个比喻是:“在本世纪诞生之初,我们发现一种美学运动的萌芽,这种美学运动后来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在长达五十年之久的一段时期内……如果以植物学家的方式来解剖这种萌芽,我们就能了解这种植物复合自然规律的全部发育史。”^④第一个比喻是强调这六个分册之间独立、平等、连续的并联关系;第二个比喻揭示了这六个分册之间发育、蔓延、生成的串联关系。这两个形象的比喻从不同的侧面说明,《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各分册与全书存在着深层的有机关联,看似孤立的每一个个案都具有透视整体文学运动的效用。

① [丹麦]勃兰兑斯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刘半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② [丹麦]勃兰兑斯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刘半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③ [丹麦]勃兰兑斯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引言”第3页。

④ [丹麦]勃兰兑斯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分册,徐世谷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1页。

三

我们编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显然受到了《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种种启发,但启发不能只是简单的模仿。如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变成对《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照搬或套用,那就只能收获东施效颦式的尴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之于《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有继承,也有创造。

“创造”之一是通过“地标性建筑”展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地图。

我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不仅追求像《十九世纪文学主流》那样在实证的基础上思辨、在微观叙述中显现宏观、通过个案透视发育的整体,我们还为以上所说的“实证基础”、“微观叙述”和“个案透视”找到了一些合适的“载体”。这些“载体”好比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地图中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将这些“地标性建筑”作为历史叙述的基本单元,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重新阐释,才能落实到操作层面。这些构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基本叙述单元的“地标性建筑”,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那些重要的文学板块,如:言情文学、白话文学、青春文学、乡土文学、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武侠小说、话剧文学、延安文学、红色经典、散文小品、台港文学、新诗潮、女性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历史叙事、文学史著述、影视文学、网络小说等。我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作为丛书,各分册由以上具体的文学板块组成。各分册与整个丛书的关系是分中有合、似断实连。所谓“分”与“断”,是要做好对每一个“地标性建筑”(文学板块)的研究。这样的个案透视既能使实证研究获得具体的依傍,又能把微观描述中落到实处;所谓“合”与“连”,是要在对一个个“地标性建筑”(文学板块)聚焦中观测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嬗变。

“创造”之二是通过“历史档案”和“学术新探”两套书系深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

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确给予我们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这只能说明我们从中获得了西方学术的有效营养。然而,西方的学术资源无论具有多少普适性,对于解读中国的文学艺术、中国人的心灵,毕竟是有限度的。今天,在超越株守传统的保守主义、走向全面开放的今天,在超越盲目崇洋的虚无主义、畅想民族复兴的今天,中国本土的学术资源更要得到应有的重视并加以现代转化。

“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一直是中国人文学术的两大传统。我们

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力求“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结合。这既是本课题学术目标和学术规范的要求,也是本课题的特色所在,更是本课题学术质量的保证。由于目前学界相对忽视“我注六经”的研究,因此本课题提倡在做好“我注六经”的基础上,做好“六经注我”。为此,本课题成果分为两套书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历史档案书系》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学术新探书系》(以下分别简称《历史档案书系》、《学术新探书系》)。出版这两套书系将有助于深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

首先,出版《历史档案书系》无疑体现了对文学史文献史料的高度重视。这种重视既强化了文献史料对于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作用,又传达出一种重要的文学史理念——文献史料是文学史“本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每一个文学板块的文献史料进行多方面、多形式的搜集和整理,展现这一文学“地标性建筑”的原始风貌,直接、形象、立体地保存了这一文学板块的历史记忆。这岂能不是文学史的“本体”呢?如傅斯年宣扬过“史学便是史料学”^①。再如,勃兰克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的文献史料多不是以论据的形式出现,而常常构成叙述对象本身。当今天的读者同时看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这两套书系平分秋色的时候,这种理念应是一望便知。

其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的每一个文学板块都有“历史档案”和“学术新探”两部著作。二者的学术生长关系将会推动这一板块的研究甚至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深化。两套书系中的所有文学板块完全相同,即每一个文学板块是同一个子课题,如朱德发教授负责“五四白话文学”子课题。他既要为《历史档案书系》编著“五四白话文学”卷的文献史料辑,还要在“五四白话文学文献史料辑”的基础上撰写《学术新探书系》中刷新“五四白话文学”问题的学术专著。显然,这样的两部著作之间具有学术生长关系。前者既重建了这一文学板块活生生的历史现场,又为后者的学术创新做好了独立的文献史料准备;后者的“学术新探”由于是建立在“历史档案”的基础上,不仅能避免轻率使用二手材料所造成的史实错误和观点错误,而且以往不为所知的文献史料会帮助研究者不断走进未知世界,不断获得全新的学术发现。所以,“历史档案”会成为“学术新探”的不竭的推动力。

^① 《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9页。

四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还有几个需要说明的具体问题：

1. 关于“主流”

本课题组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中的“主流”界定为：“以常态形式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的文学”。也就是说，所谓文学“主流”，不是先锋文学，而是常态的文学。常态文学的发展，总是与和读者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例如，“五四”时期的启蒙文学是属于少数读者的文学，也就是“先锋”文学，所以不是当时的“主流”文学；而这一时期的白话文学适应了多数读者的要求，成为晚清以来不断转化成的常态文学。

2. 关于《历史档案书系》

如前所述，《历史档案书系》不仅是为重新勾勒20世纪中国文学主流的历史发展提供文献和史料基础，而且通过各个重要文学板块文献史料的整体复原，尽可能直观、立体地呈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本体”的原生态风貌。因此，《历史档案书系》追求文献和史料的“原始”性。《历史档案书系》各卷的内容以“原始史料”和“经典文献”为主，以“回忆与自述”和“历史图片”为辅。所有文献和史料凡是能找到初版本的，我们均选初版本；个别实在找不到初版本的，我们选尽可能早的版本。

3. 总课题与子课题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是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承担的集体项目。总课题的选题及其初步编写方案由主编设计，在课题组成员认真讨论的基础上形成实施方案。子课题作者均为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团队成員。各个子课题的承担者大都是这一文学板块的研究专家。主编和课题组成员充分尊重各子课题作者的学术个性，以保证各卷作者学术优长的发挥和各子课题学术质量的提升。各卷作者拥有独立的著作权，文责自负。

读者目前看到的只是《历史档案书系》已经完成的大多数子课题书稿。根据本课题设计方案，还有少分子课题没有完成，如言情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延安文学、台港文学、影视文学……，尚未完成的子课题待日后推出。虽然“面面俱到是做不到的”，但我们还是想尽可能地完成这一课题的学术目标。

4. 并非题外的话

本课题首先从历史档案做起。这也是继承了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

代文学学科一脉学术传统。1951年,田仲济教授来到山东师范学院国文系任教不久就开设了“中国新文学史”课程,很快就组建了独立的教研室。山东师范学院遂成为国内最早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少数几个高校之一。1955年又成为国内最早招收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四所学校之一。田仲济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高度重视文献资料的建设。在他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山东师范学院图书馆很快成为国内很有影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料中心之一。我校的另一位前辈学者薛绥之先生尤其擅于研治文献和史料。以薛绥之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术前辈,早在1950年代后期就推出了国内第一批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史料收集、整理和研究的资料成果。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以“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名义编印的《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近20册)成为国内学界公认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学的奠基之作。其中有《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索引》、《中国现代作家著作目录》、《中国现代作家小传》,以及十几位重要作家每人一册的研究资料汇编。1970年代薛绥之先生等人又完成了《鲁迅生平资料丛抄》11册。1980年代我学科冯光廉、查国华、韩之友等人又参与了《鲁迅全集》、《茅盾全集》的编注工作。他们与我校其他老师还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6个子课题。此后,文献史料研究一直是山东师范大学的优势研究方向,在老舍生平资料、郭沫若文献辑佚等方面保持领先地位。回顾这一切,只是想说明本学科承担《历史档案书系》具有学术传统的积淀和文献史料的积累。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这两套书系是一种全新的文学史实践,难免存在尝试之作的稚嫩和偏差。我们渴望得到专家们的批评和帮助。我们最忐忑的是,不知学界的同行们能否认同——文学史的这样一种做法。

魏 建

2013年春

目 录

原始史料

个人写作与宏大叙事	李大卫、李冯等	3
负重的民族秘史——《白鹿原》对话	畅广元、屈雅军、李凌泽	15
历史意识与文学创作	宗仁发、纪众等	22
一部大小说——关于李锐长篇新著《无风之树》的交谈	李国涛、成一等	33
记忆与历史：家国之思——关于《赤彤丹朱》的对话	张抗抗、张颐武	40
关于《许三观卖血记》及其他	余华、潘凯雄	52
文学视野中的“最后”景观	肖云儒、李星等	62
《丰乳肥臀》是一部“近乎反动的作品”吗？——评何国瑞先生		
文学批评中的观念与方法	易竹贤、陈国恩	71
历史风貌的文化叙述——王旭烽访谈录	王旭烽、孙侃	79
关于长篇小说《逝水》的通信	李星、赵本夫	87
元历史小说——对周梅森小说现象的新的提法	晓华、汪政	93
从《红高粱》到《檀香刑》	莫言、王尧	99

重要文献

沦落与救赎——苏童《我的帝王生涯》读解	吴义勤	121
历史的认同与超越——新时期作家主体动向	洪治纲	132

历史的人与人的历史——《少年天子》沉思录	雷 达	145
评《曾国藩》与《雍正皇帝》的竞领风骚	胡 平	169
当代历史小说的现代性与创造性	胡良桂	174
独特的农民文化历史观——论刘震云的“新历史小说”	贺仲明	191
叙事话语的颠覆：历史和文学	南 帆	200
走向文化与人性探险的深处——作为“新历史小说” 一支的“匪行小说”论评	张清华	219

回忆与自述

《白门柳》的追述及其他	刘斯奋	231
历史小说创作之管见	凌 力	241
《旧址》序言及后记	李 锐	245
附 录		247
编后记		309

原始史料

个人写作与宏大叙事

——对话之一

李大卫 李冯 李洱

李敬泽 邱华栋

泽：今天主要是清理“行话”，我们大家都用90年代以来形成的一套语言在讲话，比如个人写作、宏大叙事等等，但实际上，对词语的运用经常是在不同的逻辑平面上展开的。倒不是说我们要给它一个准确的定义、准确的说法，而是把这些我们常说常用的关键概念谈一谈，清一清。整个“新生代”——叫不叫“新生代”且不去说它——整个这样一批作家的出现，从90年代初算起到现在，将近十年了，大家都感到有必要清理一下自己的理论资源、艺术资源，通过反思、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去开辟新的可能性。第一个问题是“个人写作”，谁先谈？

卫：“个人写作”李洱想得较多，李洱先谈，我后发制人。

泽：现在我们需要一个靶子（众笑），李洱，你就来吧。

洱：我理解的个人写作第一是逼近个人经验的写作，第二是呈现个人生活的真实性。我感觉在中国提个人写作有它的意义，就是对革命话语的反拨。同时我也感觉到个人写作带来的问题，既然它是逼近个人经验的个人性写作，表现在作品中应该不一样，不仅是作品的风格不一样，而且每个人所展示的个人性、真实性是不一样的。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的个人化作品，它们反而非常类似，我把这称为经验同化。所以看起来有个悖论，本来个人写作是应该充分展示个人经验、逼近个人真实性的，他们之间应该有很大差异，但是现在反而出现了很多类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它展示了我们面对的很大的困境，可能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还是非常大，其实我们的个人经验不是真实的个人经验，其中包含着许多芜杂的、虚假的成分。我所说的个人真实性是指个人与时代、历史之间的内在关联，这种内在的关联并没有充分地展示出来，如果展示出来的话，他们之